

# 日本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强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锋

（《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期）

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是目前中国在国际战略领域面临着的最为紧迫的挑战之一。展望未来20年的中国国际战略环境，来自于日本战略挑战甚至超过了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两国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至今无法化解的“历史情结”，两国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更难消除、“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作用比中美关系更加明显。而两国又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普通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都在进步发酵。例如，在2006年3月举行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中，美国国务卿赖斯谈到了中国未来可能发展的“积极”与“消极”这两个面，反映了美国目前比较一贯的在中国问题上的“平衡性”看法；澳大利亚则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大国；只有日本外相麻生喋喋不休地大谈“中国威胁”。转型时期的中日两国显然对潜在的战略对抗的看法，比其他大国要显得更为消极。

其次，中日关系中的“认同危机”已经大大超越了中美关系中的认同问题，中日两国国民情感的渐行渐远不仅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产物，更是两国关系一路下滑的原因。其结果，不单两国国内都缺乏关系改善的国内政治资源，也给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继续在民粹主义旗帜下操弄两国历史争议提供了巨大空间。中日友好的社会基础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小泉政府利用日本国民的“改革意愿”，不惜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也玩弄民粹主义主题，利用日本国民对中国增加的“嫌弃感”坚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华“不低头”方针，则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社会层次上的相互排斥。反过头来，日本对华政策问题上情绪化的社会看法，又进一步给了日本政治人物采取对华强硬政策的理由。这种将两国关系国内政治化的做法，不仅大大伤害了力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而且也正在危险性地助长两国间的对抗性情绪，让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对抗性越升越高。两国间各自以对方为参照对象的民族主义的上升，正在两国社会造成一中危险性情感对立，有可能进一步煽动各自的决策者、将两国关系由局部对立而推向全面对立的轨道。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经由民族情感的对立并进而产生狂热的民族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历史问题目前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表现，恰恰正在产生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民族情感对立的危险。例如，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与媒体的片面引导下，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抓住二战历史不放，就是为了让日本永远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是要永远“矮化”日本。在这样的情绪化的认识中，两国历史问题的争论已经偏离了“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而越来越变成了单纯涉及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权力较量。小泉政府及其追随者拒绝放弃靖国神社参拜，就是一直在试图模糊在历史问题上的中日争论从中方的立场来看始终是单纯的“价值判断”的立场，而故意地将这场争论抹黑为是中国旨在永远想要“压制日本”的图谋。日本这么做的必然结果，当然就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防范、警惕和嫌弃意识也在同步上升。

第三，在日益对抗性的历史问题认识和排斥性的民族情绪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中冲突性的利益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例如，中日之间有着领土争议的钓鱼岛问题、能源竞争的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问题以及今后各自的战略动向问题，这些问题交错在一起，一旦出现过激的对策或者“擦枪走火”的事件，究竟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什么样新的伤害目前还很难下定论。至少，中日关系在恶化后的今天，还没有出现过危机事态处理的经验，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与控制机制。一旦出现危机，如何控制与化解，至今还是未知数。中美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经历了 1996 年的台湾海峡导弹试射事件、1999 年的“炸馆事件”和 2001 年的“空中撞机事件”。在这三次事件中和事件后，华盛顿和北京不仅经历了危机考验，而且也基本摸索出了如何控制危机的办法与措施。但中日关系还没有在冷战后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历程。两国是否能在未来真正控制和化解危机、避免关系进一步向对抗方向升级，目前尚难以乐观。

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已经超越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问题如果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家与另外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存在着“麻烦”关系的话，那么这种“麻烦”的性质和表现从今天来看是可以预见和可以管理的。这不仅来自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宣示，也来自于今天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共同利益的发展与相互间无法分离的合作需求，更来自于冷战结束 15 年之后两国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已积累起的经验和彼此相互理解的深化。无论是布什总统所说的“复杂、但重要”的关系定性，还是已经写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佐利克公式”——“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层面的关系稳定在未来 20 年是可以期待的。但中日关系则完全不同。目前，维持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72 体制”——建立在 1972 年两国建交公报和 1978 年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基础上关系原则和处理机制已经基本崩溃。什么是支撑和发展中日今天友好关系的基础和原则，这是一个需要中日两国共同思考和决断以便重新“定位”的问题。

客观来说，靖国神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中日关系目前难以改善的症结是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但从深层的原因来看，靖国神社之所以能够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的最大原因，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只有在了解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动荡的中日关系中危险性很可能扩大的原因，也才能够真正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对华政策以及其战略意图的未来走向。为此，我们可以有三个层次的日中关系紧张根源的分析结构。

第一个分析层次是东亚的“权力转移”。90 年代处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展开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巨大的跃升。1995 年中国的 GDP 总值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排在第 9 位，到 2005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已经跃升到了世界的第 5 位。这 10 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于翻了一番，而同比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增长了 6.4%，欧洲增长了 7.2%，美国增长了将近 30%。目前，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还有 20-30 年的高速增长的空间。到 2015 年，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过德国占据世界第 3 位，到 2030 年，中国经济规模甚至有可能超过日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有关中国是否将成为东亚区域领袖以及全球性大国的猜测与估计不绝于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国防力量在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也不断有所前进。90 年代以来中国军费持续以两位数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

国适度实现国防现代化战略的生动体现。尽管如此，中国崛起的势头和效能正在改变着东亚乃至世界的权力分配结构，世界政治中的权力配置在过去 400 年的国际关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 90 年代持续出现的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现象是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波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日本不是担心和害怕现在的中国，而是担心和害怕未来的中国——一个可能在东亚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具有和日本同等的科技与工业竞争能力、并拥有区域和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认为传统东京对华政策的目标——让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因而避免拖累东亚地区发展和日本包袱的中国、一个可以让日本大规模地推销自己的商品的中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过程中日本战略利益需要。日本需要针对一个可能“超越”与“钳制”日本的中国来作出自己的政策反应。

第二个层次的分析是日本的“战略选择”。东亚所出现的权力转移和变更并不必然导致日本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对抗的政策。由于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权力转移是以渐进的、合作性的和经济发展为导向的，这样的权力变更客观上不会刺激或者强制性地要求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对中国作出消极的、冲突性的反应。而且，由于中国崛起过程中和平与合作外交政策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与投资热点地区为区域经济所提供的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事实上中国崛起的过程是日本和区域内绝大多数国家都受益的过程。日本更是目前中日密切的经贸互动关系最大受益者之一。1995 年中日贸易总额只有 700 亿美元，到 2005 年，中日贸易额已经超过了 1893 亿美元，连续 7 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如果把中国香港地区也计算在内，中日贸易已经连续两年超过日美贸易，中国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日本仍然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采取和中国对抗姿态，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总体上的中国战略跨越了两国间的经贸联系，而将“制衡”中国（balancing China）作为日本对中国崛起首当其冲的战略选择。正是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日本小泉政府才会不实质性地影响对华贸易的基础上却加速增进美日军事同盟，加速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派遣，加速改变日本防卫的自卫队体制，加速按照美日共同军事行动和相互密切配合干预区域安全热点的原则调整日本军事力量的部署和武器系统，加速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美日联合协防台湾的态势，加速战争准备的“有事法制”，加速对所谓中欧武器贸易的外交关注。正是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选择的主导下，日本需要利用所谓“中国威胁”凝聚国内共识，通过不向中国在靖国神社上妥协和污蔑中国干预日本内政的指责，来全面摆脱因为历史问题而让日本总是被中国“矮化”的“扭曲心态”，从精神上寻求全面与中国对抗的心理资源。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是日本的“政策过程”。即便是权力转移以及做出相应的战略选择，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当前中日之间关系必然出现持续的紧张。因为根据权力转移而作出的政策输入以及依据战略选择而确定的政策取向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释放出相关的内容，或者，决策者们也可以按照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做法来选择“有限烈度的对抗”，并辅之于“有限范围内的合作”。今天，中日之间之所以会出现持续的“政冷经热”的状况，并出现在争议地区潜在冲突升级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在政策过程中需要中日关系的“问题状态”，并通过这种“问题状态”来克服日本长期存在着的反对宪法修改、反对海外派兵、反对日本成为拥有战争权的“普通国家”的和平主义。所以，紧张的、甚至是危机性的

日中关系的“问题状态”是日本现行政策过程的需要，是通过这样的政策过程促进日本国内防务政治与战略转型的需要。说到底，日本今天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固执与偏狭，并非是小泉首相个人性格特点的结果，更不是简单地为了迎合日本民众的对华不妥协的主流看法，而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过程本身是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是日本实行“三位一体”层次上对华战略变化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目前日中关系的低迷状态更需要有足够清醒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准备。即便 2006 年 9 月新的日本首相能够采取一定的妥协姿态松动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但在日本目前“三个层次”上的对华制衡战略的主导下，日中关系紧张的长期化与复杂化是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的。

《现代国际关系》，2006 年第 4 期